

创痛记忆： 新马两地有关日占时期的旧体诗

林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摘要

笔者此前曾对《血海》和《兰花集》两部关于新加坡沦陷时期的旧体诗集作过研究，本文则进一步探讨其他诗人对该段历史的创痛记忆。他们仍秉承中国的“诗史”写作传统，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记录战时惨痛的经历和内心感受。透过旧体诗创作，他们承担了现代学者所说的“记忆的责任”，并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过往的错误。

关键词：日占时期、新加坡、马来亚、华文旧体诗、创痛记忆

Traumatic Memories: Classical-Style Poetry about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LAM Lap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ontinuous study of the classical-style poetry about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While my previous papers focus on three poetry collections, including the *Sea of Blood*, *Collection of Kalpa Ashes* and *Collection of Orchid Flowers*, here I turn to other poets to examine their traumatic memories of historical incidents, people, and personal sufferings. I argue that these poets followe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writing history through poetry” (*shishi* 诗史), and recorded their war-tim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from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erspectives. By doing so, they fulfilled what modern scholars called the “duty to remember” and warned later generations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of history.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Malaya, Classical-style Poetry, Traumatic Memories

创痛记忆： 新马两地有关日占时期的旧体诗

林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引言

马来亚与新加坡相继在二次大战时被日军攻陷，新加坡被易名为“昭南岛”（Syonan-to，昭南意为“南方之光”）。¹ 在为时三年多的占领时期，两地华人均饱受日军的欺凌和迫害，特别在初期，为报复抗日运动，日军更肆意杀害华人。² 大规模的如新加坡进行的检证大屠杀，遇害人数至少达二万五千。³ 小规模如檳城的钟灵中学，其师生因积极参与抗日，也遭到日军的残杀。⁴ 这些惨痛的经历，在战后出版的史籍和回忆录中都有所记载，并造就了小说、散文、新诗等申

¹ Constance Mary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8.

² 关于日军在两地所犯的罪行，参见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页522–544。

Lee Enha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Wu-Nan Book Inc., 2003), pp. 522–544.

³ 据日军随军记者高濂称，日军原定屠杀五万人，实际屠杀的数字，约为五万人的半数。而1946年9月11日的《星洲日报》、《总汇报》社论则提到，根据战时檳城《彼南日報》载称，新加坡被检证的“不良分子”为七万余人。日本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亦引1942年的《朝日东亚年鉴》记载，认为新加坡共有七万华侨被检证。

引自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页533–535，Lee En Ha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 533–535; Ralph P. Modder,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ssacre: 18 February to 4 March 1942*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4), pp. 3, 58; “Plan to kill 50,000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Strait Times*, 19 March 1947, p. 5.

⁴ 马来西亚钟灵校友会联合总会《钟灵中学校史》（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钟灵校友会联合总会，2012），页3，Persekutuan Alumni Chung Ling Malaysia, *History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Petaling Jaya: Persekutuan Alumni Chung Ling Malaysia, 2012), p. 3;

陆培春〈钟灵中学师生惨案〉，《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3年零8个月》（吉隆坡：隆雪中华大会堂；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2014），页130–139，Loke Pooi-choon, “The Massacre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sia: The Tragic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Kuala Lumpur: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Malayan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Society, 2014), pp. 130–139.

诉日军暴行的创伤文学。⁵ 此外，还有大量的华文旧体诗词，采用叙事和抒情的笔法，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华人社会集体与个人的创伤经历。其中有三部关于新加坡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最值得注意，包括谢松山（1891–1965）的《血海》、李西浪（1898–1972）的《劫灰集》和郑光汉（1909–1971）编的《兰花集》。⁶ 笔者曾在两篇论文中，从创伤记忆、叙事文学、遗民书写和群体唱和的角度，重点探讨了这三部诗集的出版过程、内容、创作手法、史学及文学意义。⁷ 兹略复述如下：

《血海》以纪事诗的形式，附以详尽的注文，追述了新加坡在日占时期种种社会畸形的怪现状，并记录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有关屠城大检证的情况。作者谢松山原署名“浩劫余生”，以〈昭南竹枝词〉为题，将最初的五十一首作品，从1946年6月6日至6月28日连载于《南洋商报》，主要描绘日军统治下的新加坡社会。⁸ 后来这组诗在1947年易名为〈昭南纪事诗〉，另增加了五十首关于检证大屠杀的作品，分两期在《南洋杂志》上发表，署名仍是“浩劫余生”。⁹ 最后在1950年，再由《南洋商报》改以《血海》的名称集结成书出版，署名谢松山。此书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回响，曾在同一年三度再版，又收录了众多作者的序文和题诗，足见日占的创伤回忆，在华人社会是非常广泛和深刻的。

⁵ 小说有李过的《昭南岛的故事》、林参天的《余哀》、丘天的《复仇》，苗秀的《火浪》和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散文集有李金龙的《日治时期的童年生活》。另参考Yeo Song Nian, Ng Siew Ai,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Reflected in Singapore-Malaya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5–49),” Patricia Lim Pui Huen,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106–119.

⁶ 谢松山《血海》第3版（新加坡 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0）。

Xie Songshan, *Sea of Blood*, 3rd Edition (Singapore: Nanyang Siang Pau, 1950).

李西浪《劫灰集》（香港 永发印务有限公司，1946）。

Li Xilang, *Collection of Kalpa Ashes* (Hong Kong: Wing Fat Printing, 1946).

郑光汉编《兰花集》（新加坡 郑光汉，1966）。

Zheng Guanghan (ed.), *Collection of Orchid Flowers* (Singapore: Zheng Guanghan, 1966).

⁷ 林立〈劫灰与兰花 新加坡日据时期的两部旧体诗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3期（2016），页237–265，Lam Lap, “Kalpa Ashes and Orchid Flowers: Two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s in Singapore’s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3 (2016), pp. 237–265;

〈亦诗亦史 描述新加坡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血海》〉，《清华学报》第47卷第3期（2017），页547–589，Lam Lap, “Sea of Blood: A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 about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47, No. 3 (2017), pp. 547–589.

⁸ 〈昭南纪事诗〉现收录于李庆年《南洋竹枝词汇编 中国以外唯一竹枝词汇编》（新加坡 今古书店，2012），页249–256。

Li Qingnian, *Compilation of Bamboo Branch Verses of Nanyang: The Only Compilation of Bamboo Branch Verses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Books and Arts of All Ages, 2012).

⁹ 浩劫余生〈昭南纪事诗〉上、下卷，《南洋杂志》第2卷第3、4期（1948），页49–55，74–78。

Haojie Yusheng, “The Chronicle Poems of Syonan,” *Nanyang Miscellany*, Vol. 2, No. 3 & No. 4 (1948), pp. 49–55, 74–78.

《劫灰集》和《兰花集》的作品，都写于新加坡沦陷时期，属于地下文学，战后才出版。《劫灰集》收录了李西浪写于日占时期的诗作，以抒情为主，记载了一位文人在铁蹄下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心理状态，以及“朋辈间痛念家国，感怀身世之心情”，而又多“慷慨悲歌，苍凉沉郁”之调。¹⁰ 其中一些作品写于郑光汉在其寓所思汉斋举行的唱酬活动，后来也收入郑氏所编的《兰花集》。李西浪在诗中，把日占下的新加坡形容为“地狱”或“鬼域”，对趁机谋取私利、自愿媚敌者，则屡加讽斥，表现出一副铮铮铁骨。《兰花集》是集体唱和。郑光汉因寓所中的兰花盛开，召集朋侪举行雅集，前后共七次，首倡于癸未年（1943）十月，迄于乙酉年（1945）六月。参与者共十人，包括：郑光汉、胡浪漫、郑文通、李西浪、傅无闷、沈逸史、苏秋生、李铁民、洪一炉、谢云声。他们以郑思肖（1241-1318）等南宋遗民为楷模，透过咏兰，表达对日军的愤恨和对光复的冀盼，以及抑塞无聊、借酒浇愁的情态。

受中国传统诗学影响，旧体诗人在创作时，一般都有纪史、纪事、记人的使命感，所谓“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¹¹ 诗人仿佛就是时代的代言人，以其个人经历或见闻，反映民生疾苦及各种社会乱状，这种使命感，在战乱时期尤其明显。建安诗人、杜甫、陆游、吴伟业、黄遵宪等在不同时代经历兵燹的作者，便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从西方创伤记忆理论的角度而言，将沉痛的历史经验透过书写传达给下一代，不仅起到警世作用，还有助抚平精神的创痛。¹² 因此重复地表达哀伤和承认惨痛的过去为历史的一部分，乃是脱离精神创痛的必要一步，受创者也可以借助对战争的控诉、谴责等道德裁决的话语，重新建立人的尊严。是以槟城诗人管震民（1880-1964）在为谢松山的《血海》作序时说：

[是书]义正辞严，直秉董狐之笔，穷形尽相，如燃温峤之犀；
血泪盈盈，历千秋而不灭！海天淼淼，亘万古而犹腥。……惟祈血化装
宏，尽洗昭南之污迹，更望海填精卫，永平星岛之回潮。¹³

¹⁰ 李铁民、傅无闷〈序〉，李西浪《劫灰集》，页4a-5a。

Li Tiemin, Fu Wumen, “Forewords,” Li Xilang, *Collection of Kalpa Ashes*, pp. 4a-5a.

¹¹ 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四部备要》经部第1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7，阮刻本重印），页49。
Kong Yingda (annotated), *Correct Meanings of Maoshi*, collected in *Sibu Beiyao*, Category Jing,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7, reprint of Ruanke Edition), p. 49.

¹² “记忆不但能引起创痛，它还能治愈创痛。” (Memory not only causes pain, it heals.)
Thomas Butler, “Memory: A Mixed Blessing,” Thomas Butler (ed.), *Memory: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Mi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26.

¹³ 管震民〈序四〉，谢松山《血海》，序页24。

Guan Zhenmin, “Forewords 4,” Xie Songshan, *Sea of Blood*, p. 24 (Forewords Section).

篇末隐然有渴望抚平精神创伤的含义。谢松山自己的再版序，则特别强调人类的同情心，称这是“人群进化的里程碑，是社会互助的有力支持，人类苟无这种同情心，世界将立即陷于毁灭。”而读此书者，自然会对“千千万万无故被驱往郊外或海滨活活杀死的同胞表示无穷的哀悼”。¹⁴ 这些死难者虽然含恨而逝，但诗人却用抒情的笔调为他们昭雪前耻，让他们可以永远留存在读者的记忆中。

除了《血海》、《劫灰集》和《兰花集》，尚有不少写于战时或战后，有关新、马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词，散见于后来出版的个人诗集和报章内。这些作品或抒写作者哀生念乱的心情，或揭露日军的暴行，或追怀不幸丧生的友人，或描述战后仍然动荡的局势，以不同的声音，发出那个时代华人社会集体的悲吟与控诉。以下笔者便从纪事、记人与个人感怀三方面，勾陈这些零散诗篇蕴含的集体与个人创伤记忆，探讨其文本和文献价值。当然，三者往往在一首作品中互为表里，并不可截然划分。笔者的论述，将根据章节的需要聚焦于作品的有关方面。

纪事

纪事之作，主要描写新、马沦陷的过程，以及日军屠杀华人和实行高压统治的情况，类近“诗史”。中国的“诗史”传统，从杜甫记述“安史之乱”的作品开始，往往与民族苦难和创伤书写息息相关。陈平原曾指出：“‘诗史’诗人这么一个称号，不单属于杜甫，而且属于一批生活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诗笔记下民族的苦难与屈辱，表达民族的悲愤与希望的爱国诗人。”¹⁵ 龚鹏程在研究中国“诗史”概念时也说，与西方偏于想像性寓意、带有宗教精神的史诗不同，“诗史代表一种价值观念，而此观念之发轫，往往在历史文化意识勃兴之际。论者渴望在诗中展现作者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理想，纪录并批判一代史事。”¹⁶ 蔡英俊亦持相同的看法，认为“‘诗史’此一概念所指陈的历史事件的面向，是《春秋》式的对于事件意义与价值的解释或判断，而不是以情节构造与铺展为主的叙

¹⁴ 谢松山〈血海再版序〉，谢松山《血海》，序页11。

Xie Songshan, "Preface to Reprint Edition of *Sea of Blood*," Xie Songshan, *Sea of Blood*, p. 11 (Forewords Section).

¹⁵ 陈平原〈说“诗史”——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260。

Chen Pingyuan, "About 'Shishi': And Discussing on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Chinese Poet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3), p. 260.

¹⁶ 龚鹏程《诗史本色与妙悟》（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页32。

Kung Peng-Cheng, *The Essence of Shishi and Minute Enlightenment*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93), p. 32.

述模式。”¹⁷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新、马诗人有关日占时期的作品，总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和道德批判意识，凸显华族同胞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及作者本身的悲愤之情。以下以许云樵、蔡寰青、谢松山和管震民的作品为例，审视诗人如何透过记事，呼应传统的“诗史”创作，揭示华人的集体创伤记忆。

许云樵（1905–1981），原名许钰，号梦飞，又号希夷室主，乃江苏吴县人。1931年抵达南洋。他本身是位历史学家，1940年至1958年，担任《南洋学报》的主编。1957至1961年他出任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兼任南洋研究室主任，主编《南洋研究》。1963年又创立东南亚研究所，主编及出版《东南亚研究》。一生著述甚丰，尤其对东南亚研究有卓著的贡献。¹⁸ 对于日占时期的历史，他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编有《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一书。¹⁹ 他的旧体诗收录在《希夷室诗文集》内，其中若干首即与沦陷有关。

作为一位学者，许云樵在创作旧体诗时，也尽可能附上详细的背景资料。首先这反映在诗题的纪事性方面，如〈壬午元旦星洲为日军攻陷改名昭南岛，新贵蜂起，沐猴而冠，扰攘不已，书此志感〉和〈昭南时代肉价飞涨至每斤四百元感赋〉，分别交代了沦陷时间和物价，看来有点像新闻标题。²⁰ 另有一些作品的标题都称为“即事”，显然也有纪事的功能。不但如此，许云樵还在诗后附有颇长的注脚，交代事情的始末。如〈学贾即事〉：

浩劫余生僻地藏，烽烟未息少糗粮。笔耕贾祸非长策，货殖应堪隐伪装。

阿堵常来随手散，乘机亦得拯羔羊。昭南幻灭魔魔去，囊橐虽空喜复光。²¹

¹⁷ 蔡英俊〈诗歌与历史——论诗史的历史成分及其叙述的转向〉，《清华中文学报》第3期（2009），页240。
Tsai Ying-Chun, “On Poetry and History: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e Concept of *Shishi* and Its Narrative Tur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 3 (2009), p. 240.

¹⁸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页30，Kua Bak Lim (ed.), *Biographi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Singapore: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Pte. Ltd., 1995), p. 30;
〈许云樵〉，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xuyq.html（访问日期：2019年10月15日）。
“Hsu Yun Tsiao,”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xuyq.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¹⁹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
Hsu Yun Tsiao, Chua Ser Koon (eds.), *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ingapore: Wenshi Chuban Siren Youxian Gongsi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Pte. Ltd.), 1984).

²⁰ 许云樵〈炎微集〉，《希夷室诗文集》（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9），页23。
Hsu Yun Tsiao, “Collection of Yanjiao,” *Literary Collection of Xiyi Shi*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9), p. 23.

²¹ 许云樵〈浮生集〉，《希夷室诗文集》，页13。
Hsu Yun Tsiao, “Collection of Fusheng,” *Literary Collection of Xiyi Shi*, p. 13.

诗本身以抒情为主，其中第二联的表意辞如“非”、“应堪”等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阿堵”两句，也显示了作者对钱财（指军票）的轻视和救饥拯溺的愿望。末联称新加坡幸获重光，即使“囊橐一空”，也胜于在日人的统治下生活。而在注脚中，许云樵则写道：

星洲沦陷，因走避鹰犬而匿居山阿。后以生计所迫，乃弃笔出而学贾，以免为日人注意。与冯、郑二君设太平洋行于十八间后，业务颇盛，有一单售货达二十万元者，余以军用票无价值，故随手散去不惜，其间有欺诈及逋逃者亦置之不计。某日忽有日军曹以旧铤嘱翻新，余乃设厂以化学方法应之，大悦，取一木牌挂门侧谓为军用者，有若干同乡罹侦缉之嫌，乞为缓颊，余皆证为厂工而得免难。一九四五年八月，广岛横滨遭原子弹，日军乞降，军票作废，囊橐荡然，然得见光复，亦额手庆幸。

这段文字像一篇简短的传记那样，记述了许云樵个人在日占时期谋生的情况，也透露了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他如何利用经商之便，救助被日军迫害的同胞。这些资料虽然零碎，却也有其文献的价值，可视为史料的补充。

新加坡传统文人多以写诗为主，词则较为少见，尤其是叙事性质的词。此由于词一向被视为抒情的体裁，在叙事方面不应该如诗那么明了。缪钺在〈论词〉一文中即认为，词有“文小”、“质轻”、“径狭”、“境隐”几种写作特征，并说：“文能说理叙事，言情写景；诗则言情写景多，有时仍可说理叙事；至于词，则惟能言情写景，而说理叙事绝非所宜。此虽因调律所限，然与词体之特性亦有关系。”²² 姑勿论这种看法是否完全恰当，但叙事性的词数量不多，却是不争的事实。蔡寰青的《锦堂词》，内有几首作品记载新、马的沦陷与光复，因此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蔡寰青（1907-1970），祖籍广东澄海，毕业于正风文科大学及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工诗词书画。他在1939年12月抵达新加坡，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秘书，后执教于柔佛新文龙中华中学，晚年受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著有《未庵画记》、《诗书画印丛编》、《战马吟》、《分光集》、《少年集》、《锦堂词》等。²³

²² 缪钺〈论词〉，载《缪钺说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7。

Miao Yue, "Discussion on *Ci*," *Miao Yue's Study of C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 6-7.

²³ 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209，Kua Bak Lim, *Biographi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p. 209；潘国驹主编《新加坡潮州文化名人录》（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19，Phua Kok Khoo (ed.), *Teochew Cultural Celebritie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2016), p. 19。

《锦堂词》有五首作品与沦陷历史有关，分别是〈破阵子·马来亚失陷〉、〈木兰花慢·记日军建忠灵塔〉、〈齐天乐·日皇投降〉、〈江城子·联军胜利〉和〈阮郎归·新加坡康复〉。兹以〈木兰花慢〉为例论之。忠灵塔（Chureito）是日军为纪念在新加坡战事中阵亡的将士而建，地点在武吉知马高地。²⁴ 日军在投降后，即自行将之拆除。蔡寰青的这首作品，讥讽了日军的侵略行为，但也不无感悼生灵之辞：

问君知否，算几处是名丘。看此日狮城，降旂乍竖，战迹还留。忠灵纵堪砌塔，惜河山骯髒未全收。残壘英军旧别，深沟日骑新愁。

潇潇暮雨鬼啾啾。呜咽遍南陬。正群众悲号，交谗相国（指东条英机），叛怨王侯。劳师远征何为，恐天涯寒骨秽芳洲。漫说招魂恨事，佇看断碣东流。²⁵

上片以问句展开，“君”字用得颇妙，似乎是对那些阵亡日军发出的诘问。“名丘”两字也相当有挖苦的意味。之后便进入叙事，首先提及新加坡的光复，继而对日军建造忠灵塔一事作出评论。“骯髒”二字，看出作者对阵亡日军的蔑视，这和下片的“秽”字有同样的意思。下片写这些亡灵与亲属的哀号，矛头指向发动战争的东条英机，称其“远征”之举不但徒劳，而且让阵亡将士遗臭于狮城。最后像前人的怀古作品一样，讽刺日军建塔招魂是白费心机，这些“断碣”终将被历史的河流洗刷剩尽，被人遗忘。因为有历史叙事的成分，作品不无直白之处，如“群众悲号，交谗相国”一句。类似的语句在蔡寰青的其他几首词中也时有出现，如〈齐天乐〉云：“只赢得南征，马来州府。国碎民疲，天皇一诏泪如雨。”又如〈阮郎归〉云：“美苏齐列冠中英，百年真未曾。”²⁶ 都显得过于质实。但作者毕竟是透过论史，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作出控诉，而这种个人的声音，其实也代表了当时新加坡人集体的意见。

檳城钟灵中学的惨案，是另一起让新、马诗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事件。由于该校师生在沦陷前曾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因此日军在1942年4月5日、6日，逮捕该校教员共十人，最后仅得二人生还，罹难学生更多达四十余人。曾在钟灵中学任

²⁴ 日军在多个占领地，都建有类似的纪念塔。据称新加坡的“忠灵塔”和同样纪念日军阵亡将士的“昭南神社”，建造费用为二十余万元，都是搜刮民脂而来。

〈沦陷时期的人民生活〉，收入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页420。

“The Daily Life of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su Yun Tsiao, Chua Ser Koon (eds.), *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p. 420.

²⁵ 蔡寰青《锦堂词》（新加坡 蔡廉溪等整理，2011），页14。

Cai Huanqing, *Jintang Ci* (Singapore: Compiled by Cai Lianxi et al., 2011), p. 14.

²⁶ 同上，页16-17。Ibid, pp. 16-17.

教的诗人管震民，其夫人、哲嗣和长孙都在沦陷时期遇难。他在1946年春分别写了〈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序〉和〈钟灵中学追悼殉难师生祭文〉两篇文章，纪念钟灵中学惨案的亡魂。如前文指斥日军“用百般惨酷之刑，縲紲同羈，罪非公治，焚坑重演，毒过嬴秦，鬼哭神号，人天共愤，暴屍露骨，魂梦何安？”²⁷ 后文在谴责日军的罪行后致悼云：“哀哀诸子，谁无室家？突闻噩耗，泪雨如麻。永无欢乐，惟有吁嗟。人生到此，痛如之何？”²⁸ 以沉痛之笔触，书写了该校师生的集体创伤记忆。及后，钟灵中学在1947年1月出版了《槟城钟灵中学殉难师生荣哀录》一书，内收录了各种纪念文稿，包括挽联和诗词。管震民也有六题的作品收录在内。²⁹ 撰写《血海》的作者谢松山，在阅读了此书后，唱和了管震民的作品，诗云：

人间依旧有啼痕，血肉余腥今尚存。草满荒郊寻曝骨，书成实录当招魂。
深惭后死难为继，欲抚遗孤岂市恩？此日虾夷长屈膝，九原应许息烦冤。³⁰

此诗采用了抒情的笔调，除了向殉难师生致哀外，还表达了作者因“后死”而惭愧的心情，以及欲抚恤死难者遗孤的愿望（第三联）。首联“人间依旧有啼痕，血肉余腥今尚存”，显见在世者的创伤尚未治愈，而末句“九原应许息烦冤”，却祈盼死者能就此安息。所谓“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作为战乱的幸存者，惨痛的回忆恐怕毕生也难消弭。

记人

记人是存史的一部分。虽然这或许属于作者个人的记忆，但却有特定时代的社会与群体属性。正如集体记忆理论的奠基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所言：

²⁷ 管震民〈文钞〉，《绿天庐诗文集》（槟城 康华印务公司，1955），页6。

Guan Zhenmin, “Prose Section,” *Literary Collection of Lütian Lu* (Penang: Kanghua Yinwu Gongxi (Kanghua Press), 1955), p. 6.

²⁸ 同上，页23。Ibid, p. 23.

²⁹ 管震民等编《槟城钟灵中学殉难师生荣哀录》（槟城 钟灵中学，1947），页74–75。

Guan Zhenmin et al. (eds.), *An Elegiac Record of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Martyrs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Penang: Chung Ling High School, 1947), pp. 74–75.

³⁰ 谢松山〈读《槟城师生鍾中殉难荣哀录》后次管震民先生原韵〉，《南洋商报》，1947年4月1日，第11版。Xie Songshan, “Reading *An Elegiac Record of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Martyrs of Chung Ling High School* and Responding to Mr. Guan Zhenmin’s Poem,” *Nanyang Siang Pau*, 1 April 1947, p. 11.

另有刘楚材、陈瑞祥和诗，见《南洋商报》，1947年5月1日，第11版；4月19日，第11版。按 管震民原诗未见载。

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而且，除非我们把个体与他同时所属的多个群体都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记忆所具有的相对强度，以及它们在个体思想中联合起来的方式。³¹

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词中，有不少怀念遇害或病故亲友的作品。它们一方面记述死者的生平与亡故始末，既悼其人，亦伤其事，抒发了作者悲愤交集的心情。它们的记忆点是零散的，但又是集体的，因为引发作者创痛回忆的原因，以及作者感受苦难经历的程度都大体一致，不能单独将之抽离于那个时代的群体经验。悼念钟灵中学国文教师陈少苏的作品，显然就有这种个体与群体记忆兼备的特征。

陈少苏（？-1943），原籍福建诏安，27岁时到南洋任教，是当地著名的诗人，著有《生春堂词》。屠杀惨案发生后，他因悲愤过度病逝。他的死引起了一众文友的哀悼，管震民即撰有〈追悼陈少苏先生文〉及〈奠基文〉两篇，前文在复述惨剧始末后嗟叹道：“人非木石，谁不悽怆？公躯本弱，又厄红羊。积愤成疾，遂入膏肓。梨花寒食，洒泪北邙。斯文已丧，天道茫茫。”³² 为陈少苏撰写悼亡诗词的，另有沈亭、曾梦笔和谢松山等。³³

谢松山在其两首〈百字令·忆陈少苏先生〉的序文中，叙事与抒情并重，既交代了写作的背景，又感念陈氏的亡故：

³¹ “We can understand each memory as it occurs in individual thought only if we locate each within the thought of the corresponding group. We cannot properly [sic] understand their relative strength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ombine within individual thought unless we connect the individual to the various groups of which he is simultaneously a member.”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53.

中译本见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2），页93-94。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Bi Ran, Guo Jinhua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02), pp. 93-94.

³² 管震民〈文钞〉，《绿天庐诗文集》，页25。

Guan Zhenmin, “Prose Section,” *Literary Collection of Lütian Lu*, p. 25.

³³ 沈亭〈弔陈少苏夫子并序〉两首，《南洋商报》，1947年3月11日，第11版，Shen Ting, “Mourning Mr. Chen Shaosu with Preface,” (two pieces), *Nanyang Siang Pau*, 11 March 1947, p. 11;

曾梦笔〈哭陈少苏〉四首，曾梦笔遗著《南洋诗坛 听风听雨楼诗选》，网址 http://singapore-pvccard.blogspot.com/2013/11/blog-post_8684.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Zeng Mengbi, “Lamenting Chen Shaosu,” (four pieces), “Posthumous Literary Collection of Zeng Mengbi,” http://singapore-pvccard.blogspot.com/2013/11/blog-post_8684.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先生歿于一九四三年春，时正马来亚沦陷后之翌年，亦即檳城钟灵中学师生遭日寇捕杀最恐怖时期，先生目击心伤，遂致不起。今年四月五日为先生归道山五周年纪念，钟中校友特为之开会追悼，并搜集其生春堂遗著，刊以行世。是日余既为词以挽之矣，念哲人已远，风雅道废，忧患余生，云何能已！嗟乎！残山剩水，空怀旧雨之思；月夕花辰，孰证今疑之什。慨时事之沧桑，欲长歌而当哭，爰成《百字令》两阕藉志不忘。³⁴

词作本身铿锵有力，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满腔愤慨。且遣辞圆熟，艺术水平甚高，是新加坡词坛少见的佳作。

其一

江山如画，霎时间骤雨、暴风催发。俛把酒杯消磊块，怎奈愁肠如结。草满荒郊，骨埋异域，绛帐污红血。广陵人散，伤心千古明月！

忆昔煮酒论文，生春堂上，雏凤声清绝。白发词人高泪眼，慷慨欲追前哲。天外云遮，西窗露冷，几度添华发。桄榔吟社，重来难免呜咽！

其二

满城风雨，叹忽忽归去、道山何速。锦绣才华成绝响，惟有青山如簇。鬼火高张，人琴尽杳，幕燕同倾覆。门墙桃李，凄凉无计三木！

卅载誉遍南洲，人间世事，那复关荣辱。高卧荒烟松径冷，苦菜连根充腹。衰草天涯，夕阳古道，寂寞伤遗曲。年年今日，那堪酒旗高矗！

两首词的上片，都展现了一幅乱世的图景，充满血腥、暴力，身处其中的人，如暴风骤雨中的“幕燕”，自然不能幸免。最可伤的，是像陈少苏这样才华出众者，一旦夭折，便再难一遇。下片则追怀死者生前的荣与哀，以幸存者的口吻，为战乱中故去的友人以至所有受难者唱出悲壮的安魂曲。

除了陈少苏等不幸在战时病故的文人外，直接死于日军之魔爪者，更不知凡几。其中一位是何和平，他原籍海南文昌，南来后侨居柏加，“暇辄攻读，对

³⁴ 谢松山〈百字令·忆陈少苏先生〉，《南洋商报》，1948年4月20日，第8版。

Xie Songshan, "To the Tune *Hundred Words Song*: Remembering Mr. Chen Shaosu," *Nanyang Siang Pau*, 20 April 1948, p. 8.

于诗词，饶有逸才”。³⁵ 1942年春被日军吊于树上刺杀。其友人黄竞文检录其遗篇，刊载于《南洋商报》，一则“以飨读者”，二则以示纪念。读其诗，可知何氏在沦陷前，很有杀敌报国的抱负，兹录两首如下：

天下滔滔祸未央，楚歌到处恸悲肠。可怜弱肉遭强食，共济同舟莫待亡。
自大夜郎剑倒持，欲将华胄尽凌夷。疆场肉搏相追逐，鹿死谁家尚未知。

另有一位死难者，名为胡伯扬，他的生平事迹见载于沈庆和〈哭胡君伯扬〉一组诗的序文与注脚。据知他是安徽休宁人，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科，善词藻，善辩论，曾与沈庆和一同任教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芙蓉中学。1941年日军入侵，他率家人避难于郡高橡园，却被日军搜获杀害，同时遇难者四十余人。1946年仲夏，沈庆和与友人建一衣冠墓于宁宜（Dangi，森美兰州淡边区的小镇）冢上，以招慰其一家四口之亡魂。³⁶ 诗有六首，其中第五首提到无法寻获胡伯扬的遗骸来安葬，极表怅惘之情：

异乡埋骨本寻常，觅骨无从信可伤。永夜猿声啼不住，为谁含怨诉衷肠。

第六首写建衣冠墓一事：

宁宜冢上苦招魂，聊葬衣冠土一墩。淡酒薄肴新墓碣，杜鹃啼罢又黄昏。

衣冠墓与诗，都是幸存者忆念亡友的方式。衣冠墓今或不存，但亡者的事跡以及幸存者的记忆，却透过诗中文字一并留存下来了。地下的冤魂有知，应可稍感到安慰。

许云樵也在其作品中记载了一位叫做崔天明的遇难友人。据其诗后自注，知崔氏为上海崇明人，在招商局任电报员。因被人告发，遭日寇逮捕，诬为共党间谍，备受严刑逼供，放归时已不成人形，越日即死。³⁷ 许云樵的诗基本上以叙事的形式，重述了这则惨案。另有胡浪漫（一作浪漫）的一首诗，题为〈道庵失踪

³⁵ 黄竞文检录〈何和平君遗稿〉序，《南洋商报》，1947年9月24日，第8版。

Huang Jingwen (compiled), "Posthumous Poems by Mr. He Heping," *Nanyang Siang Pau*, 24 September 1947, p. 8.

³⁶ 沈庆和〈哭胡君伯扬〉，《南洋商报》，1946年11月21日，第7版。

Shen Qinghe, "Mourning Hu Boyang," *Nanyang Siang Pau*, 21 November, p. 7.

沈庆和的生平不详，只知他曾在1950年被委任为邦咯华联学校校长。见〈邦咯华联学校聘沈庆和长校〉，《南洋商报》，1950年12月24日，第11版。

"Pulau Pangkor Sekolah Hwa Lian Hiring Shen Qinghe as Headmaster," *Nanyang Siang Pau*, 24 December 1950, p. 11.

³⁷ 许云樵〈哀崔天明〉，《希夷室詩文集》第3卷，页14-15。

Hsu Yun Tsiao, "Lamenting Cui Tianming," *Literary Collection of Xiyi Shi*, Vol. 3, pp. 14-15.

百日柱香扈酒诗以哭之》。此诗并无序言或注脚介绍道庵的生平，故不知是其友人还是亲属。但从诗题和诗歌内容来看，他无疑是在大检证时被日军杀害。诗云：

何处松楸是墓田，招魂此日倍凄然。生当多难庸云补，死到无言最可怜。
 吆喝三声成罪讫，音容一瞬隔人天。因风敢作鳞鸿寄，念汝慈严垂暮年。³⁸

这并不是单一的故事，当时许多华人被日军抓去后，都是一去不回，尸骨无存，只留下他们垂老的父母默默承受丧子之痛。³⁹

胡浪漫（1909–1991），原名胡迈，又名胡桂浪，祖籍福建永定。他是新、马两地著名的报刊编辑，曾与郁达夫唱酬。日军侵占马来亚时，曾被拘捕十日，受尽凌辱，获释后被逼出任日人主导的《昭南日报》编辑局长。一年后，他始脱离魔爪，与家人往彭亨州立卑避难。战后，他当过《星洲日报》编辑部主持人，后来弃笔从商。⁴⁰ 胡浪漫的诗集名为《慧园诗存》，现载于互联网页，所录诗仅23首。他在序言中写道：“诗为心声，情随境异。生当战乱向太平洋过渡之秋，凡有所作，无论题材，风格，自然前后迥殊。青年时期，初则忧国忧时，每发为粗豪高亢之声，惜已尽毁于战火；继而身遭离乱，九死一生，音转悲凉沉郁。”⁴¹ 罗选才（1914–2013）为其集所作序中亦称：“大战中，日寇陷星洲，先生身沦铁蹄之下，九死一生，然仍潜形匿迹，以悲凉沉郁之调，或直斥当地豺狼，或侧击人间地狱。……是集所收先生战时及战后存诗虽不无多，然余初读之，犹为诗史。远近陈迹，举凡刀兵血火之灾，升平游宴之乐，历历重现眼前。”⁴² 当时的许多评论，都把有关日占时期的作品称为“诗史”，罗选才也如此称赞胡浪漫的诗作。但纪史以外，胡氏的作品却甚有抒情的色彩，很能见出他懊恼愤懑的复杂心情。

³⁸ 胡浪漫《慧园诗存》，<http://www.hulangman.com/poem020.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Hu Langman, *Poetry Collection of Huiyuan*, <http://www.hulangman.com/poem020.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³⁹ 洪镜湖的〈乙酉中元过炳卯墓下（时日寇屈膝投降）〉也是一首悼念被害友人的作品，见〈岛噫集〉，《镜湖吟草》（新加坡 南洋印务公司，1958），页28。

Hong Jinghu, “Zhongyuan of 1945, I Visited Bingmao’s Tomb,” in “Collection of Daoyi,” *Poetry Drafts of Jinghu* (Singapore: Nanyang Yinwu Gongsi (Nanyang Publishing), 1958), p. 28.

⁴⁰ 黄梅雨〈文星殒落 胡浪漫〉，原载《星洲日报》，1992年7月26日，转引自互联网页〈胡浪漫之诗与文章〉，<http://www.hulangman.com/about.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Huang Meiyu, “A Fallen Literary Star: Hu Langman,” *Sin Chew Daily*, 26 July 1992, quoted from website: “Poetry and Literary Writings of Hu Langman,” <http://www.hulangman.com/about.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⁴¹ 胡浪漫〈序言〉，<http://www.hulangman.com/prefacehu.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Hu Langman, “Preface,” <http://www.hulangman.com/prefacehu.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⁴² 罗选才〈《曼园诗选》序〉，<http://www.hulangman.com/prefaceMrLo.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Luo Xuancal, “Preface to *Selected Poetry of Manyuan*,” <http://www.hulangman.com/prefaceMrLo.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个人感怀

生活在日军的铁蹄下，长期备受压迫欺凌，又目睹亲友的亡故，抑塞愤慨而无可奈何，只能冀盼外部局势有所转变。这种无力感、屈辱感，夹杂着对日军的仇恨，在沦陷时期诗人所写的作品中表露无遗。有些作品也透露了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事和心理状态，带有颇浓厚的自传色彩和感伤世乱的情绪。试看胡浪漫的〈日军入市专事杀人，一班虎伥更气焰万丈，有人间何世之感〉：

率兽食人宁复论，乾坤正气荡无存。几多车驾骄新贵，何处柴门不泪痕。
垂老扬雄惭倚马，返魂精卫枉含冤。千家野哭凄怆甚，侧耳如闻三峡猿。⁴³

作品让我们想起杜甫的“诗史”笔法，次句的“乾坤正气”与末联的“千家野哭”和“三峡”，都在杜诗中出现过。作品一开首即对“率兽食人”、“正气无存”的现象表示愤怒，次联斥责那些奉迎日军的“新贵”，同情一般百姓的悲惨遭遇。第三联似是用两个典故来暗示被逼出掌《昭南日报》的惭愧之情。扬雄曾为篡汉的王莽写过赞美新朝的〈剧秦美新〉一文，被视为其一生的污点。而胡浪漫虽不欲依附日人，却不免被人误会，是以有“返魂精卫枉含冤”一句。作者通过这些典故的挪用，委婉地宣泄其自责与委屈之情。而全篇内容，则把个人与集体的创伤共冶于一炉，分别从广大与细微的视角印证了沦陷时期新加坡人民饱受占领者折磨的史实。

胡浪漫另一首题为〈岁暮〉的诗，末尾的自注更清楚地说明：“脱囚后入长《昭南日报》编辑部”。或者因为这个敏感的句子，此诗并未像胡氏的其他作品一样，出现在网页的目录中，而是在目录最后的一首诗〈酒楼夜归〉后另按“下一首”（next）的字样，始出现该诗的手稿。而且其他作品除展示手稿以外都有网页设计者重新打字的版本，惟独这首诗没有。可见设计者有特别的考虑。⁴⁴ 诗云：

万斛愁量岁暮中，生宁曳尾亦途穷。一身依魏怜徐庶，三尺亡秦想沛公。
梦断羊皮头欲白，风寒易水气犹雄。中原底定无忘告，凄绝当年陆放翁。

⁴³ 胡浪漫《慧园诗存》，<http://www.hulangman.com/poem021.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Hu Langman, *Poetry Collection of Huiyuan*, <http://www.hulangman.com/poem021.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⁴⁴ 胡浪漫〈岁暮〉，《慧园诗存》，<http://www.hulangman.com/poem023.html>（访问日期 2019年10月15日）。

Hu Langman, “End of Year,” *Poetry Collection of Huiyuan*, <http://www.hulangman.com/poem023.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诗中列举了好几位历史人物，包括不得已归顺曹操的徐庶，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有亡秦的刘邦，行刺秦王的荆轲，渴望光复中原的陆游，所有这些都意在说明，只要机会一来，即会推翻日军的统治。第五句用百里奚的典故，意思是希望有人可以将他从敌军手中解救出来。全诗的基本调子就是忍辱负重，那些处于困境或暂时不得志的古人都是他意欲效法的对象。对于胡浪漫和他的后人而言，出掌《昭南日报》一事或被视为污点，但在当时日军的暴力威吓下，这种身不由己的举措是可以谅解的。

潘洁夫（？-1994）的《餐樱楼诗稿》，是另一部值得关注的诗集。潘氏原籍广东顺德，来南洋后从商，日寇大检证时曾被拘留竟日。战后曾任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督印兼总编辑。《餐樱楼诗稿》辑有写于沦陷时期的《劫中草》五十八首，是新、马战时保存得较完整的诗集之一。教育界名人兼书法家吴得先（1893-1962）为该书所写的序文，即提到潘洁夫在日寇南侵新加坡时“尚能检战火烬余，为《烬余钞》。呻吟于敌寇铁蹄下者，为《劫中草》。星洲光复自庆得生者，为《再生草》。”⁴⁵ 当中刻画乱世心情的诗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杜甫写于安史之乱时的作品。例如〈飘零〉一首：

飘零生计似鹪鹩，忍听琵琶拨六么。忧患久经颜渐改，诗书徒读腹仍枵。

激昂长啸凌苍海，浩荡狂歌遏碧霄。极目荒凉天地异，江湖老去一华侨。⁴⁶

流离、饥饿、衰老、郁闷，但仍不失气节和斗志，这些正是杜甫乱离诗中的元素和精神。最后一句袭自杜甫〈秋兴八首〉之七的“江湖满地一渔翁”，改写后当然更符合作者的移民身份，为那一辈的华人发出了集体的哀音。又如写于1943年的〈癸未四月初七〉：

声声菱饼夕阳斜，点缀升平赖是耶。顾我归依虚奉佛，问谁沦落便忘家。

来苏欲借西江水，解困聊烹北苑茶。自度未能偏度众，明朝嘉会集龙华。⁴⁷

⁴⁵ 潘洁夫《餐樱楼诗稿》（新加坡 出版者不详，1947），序页。

Pan Jiefu, *Poetry Drafts of the Tasting Cherry Blossom Tower* (Singapore: n.p., 1947), Preface Section.

⁴⁶ 同上，页13。Ibid, p. 13.

⁴⁷ 同上，页16。Ibid, p. 16.

这首诗要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读。四月初七是佛诞日。日军侵占新、马后，对佛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是以寺院被允许举行筹赈难民的活动。⁴⁸ 苩饼即苩苩饼，是每年佛诞前后供应的饼食。沦陷时期粮食短缺，在作者眼中，苩饼上市竟然成了“升平”的点缀。他自思纵然虔心奉佛，也是徒劳；但始终无法“忘家”（言下之意是不能忘国），却也只能藉烹茶纾解困恼。最后他表达了自度而不能“偏度众”的遗憾，并含糊地以参加龙华法会作结。本来这个活动是为了超度众生，可是作者对其成效似乎是存疑的。在那个生命和人性尊严都被粗暴践踏的时代，身体或心灵所受的伤害无日无之，念经奉佛，只能说是从精神上稍为获得一点安慰而已。

结语

旧体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有很强烈的国族语言色彩。是以在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在中国有复兴的现象。彼时的旧体诗词，从五四期间被新文学界排挤、嘲骂，变成公开地以激发民族抗敌情绪、呼吁各界团结的高姿态卷土重来。⁴⁹ 新、马的文人也不例外。旧体诗的创作在沦陷前夕即相当蓬勃。李庆年甚至称，在英国殖民政府的言论限制下，马华新文学在抗战时期进入低潮，旧体诗却能“含蓄地进行着宣传抗日的工作”说明“旧体诗有着本身有利的因素”，能“与新文学分担抗日的神圣任务”。⁵⁰ 日占时期，新、马人民动辄得咎，言论进一步受到箝制，要抒发内心的愁思拂郁，以及对侵略者的愤恨，过于明白如话的新诗实在不

⁴⁸ Y. D. Ong, *Buddhism in Singapore: A Short Narrative* (Singapore: Skylark Publication, 2005), pp. 62–68; 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年），页126–130，Hue Guan Thye, *Evolution and Model: The Propagation of Taoism and Buddhism in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2013), pp. 126–130.

⁴⁹ 林立〈骸骨的迷恋——论新文学家创作旧体诗的缘由〉，载《东方文化》第43卷第1/2期合集（2010），页217–222。
Lam Lap, “Fetishizing the Past: Writing Classical Poetry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43, No. 1/2 (2010), pp. 217–222.

⁵⁰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529。
Li Qingnian, *The Evolu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Malaysia, 1881–1941*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8), p. 529.

宜，而文辞较为委婉隐微、甚至有时稍为晦涩的旧体诗，便成为新、马文人偏爱的抒情与批判工具。⁵¹ 无怪这时的旧体诗词数目，居然远过于新诗。

从本文所分析的作品来看，新、马文人有关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词普遍具有纪事、记人、个人感怀的元素，既延续了在国难时期至为突出的“诗史”传统，又秉承了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宗旨。点点滴滴的个人创痛记忆，拼合起来，即充分反映出战争为整个时代所带来的身体与精神上的集体创伤。作为苦难年代的见证人，这些诗人透过写作，履行了保罗·利柯(Paul Ricoeur)所言的“记忆的责任”(the duty to remember)，不但表达了对过去和当下深度的关注，还“把过去事件的意义传达给下一代。”⁵² 事过境迁，记忆的伤痕已日渐淡化，但这些作品的流传，还是会一再提醒我们，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大地被黑暗所笼罩，生命时刻处于刀俎之上，血与泪编织着一首首令人肝肠欲断的哀歌……

⁵¹ 袁一丹以身陷北平的周作人为例，指出相对于鼓吹言无不尽的新文学，旧诗词更有利于诗人在非常时期表达其隐密的心事。

袁一丹〈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人学者的表达策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页13-14。

Yuan Yidan, "Esoteric Rhetoric: The Expressive Strategy of Literati and Scholar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Beij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 1 (2014), pp. 13-14.

⁵² "The duty to remember consists not only in having a deep concern for the past but in transmitting the meanings of the past event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Barbara A. 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Maidenhead,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4.